

王汶石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吴 济 时

王汶石是当代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他的作品曾以能及时反映我国农村的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以活生生的人物,生动风趣的情节,朴实优美的笔调,炽热向上的感情;以他质朴、明朗、峭拔、机趣的艺术风格,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获得了文艺界的高度评价。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重读他于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出版的短篇集《风雪之夜》,却仍然感到有很强的艺术魅力,仍然从精神上得到鼓舞。在进一步提出作家要重视农村题材,要努力塑造农村新人的今天,认真研究王汶石的作品,探讨他的艺术经验,对更好地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肯定是有意义的。

王汶石是由搞戏剧创作改为写短篇小说的。一九四二年七月,他被党组织调到西北文工团工作,直到一九四九年。他作过演员,担负过行政职务,同时从事创作,除写歌词、墙头诗之外,还写过不少秧歌剧。一九四九年底,又被调到文艺杂志社担任领导工作,但对戏剧创作的兴趣仍然不减。他参加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又写了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大型歌剧《战友》。在戏剧创作方面,王汶石虽然没有取得更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长期文工团的战斗生活却培养锻炼了他的政治敏感和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才能,他的戏剧创作经验和舞台生活经验,又成为他

从事小说创作的有利条件。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的善于结构故事,善于表现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善于让人物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中作富有个性的自我表现,乃至人物语言的动作性、形象化、个性化等,都是与他在文工团的艺术生活的经历分不开的。

王汶石把主要精力转向从事短篇小说创作,自一九五六年始。一九五三年,他深入到陕西农村生活,先后参加了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以至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他亲身经历了我国农村剧烈的社会主义大变革时期,使他有了比较深厚的生活基础。收集在《风雪之夜》这个集子里的十七篇作品,除《在白烟升起的地方》是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生活之外,其余全部是这个时期他深入农村生活的结晶。

在《〈风雪之夜〉后记》中,王汶石说他开始写这些小说“有一点确实是明确的,这就是:要把笔墨献给新生活,献给新人物;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革命理想为主导,在本质伟大貌似平凡的生活现象中,概括和复制无产阶级新人物的形象,展示他们崭新的思想感情。”^①这段话对研究王汶石是很重要的,可以说这是他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的艺术特色形成的思想基础。通读《风雪之夜》诸篇,我们深深感到他确实把自己饱和着无产阶级深情的笔墨献给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生活和新人物。王汶石是张

开理想翅膀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总是着眼于我们生活欣欣向荣的一面，努力“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②。这是王汶石的可贵之处。但是，他的世界观所达到的高度，还没有能使他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问题，都有清醒的认识。当极“左”思潮以革命的名义，以无可阻挡之势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时，他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把极“左”的东西当成革命加以歌颂，在《风雪之夜》这个集子里也是有的，但这是第二位的東西。从基本方面看，王汶石善于把握我们生活的本质和主流，他善于透过平常事件，看出它的不平常的意义，通过写普通人物的生活和思想动向，写出我们时代的深刻变革。而这一切，又表现在诗的意境，淡雅的水彩画面和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之中。他的作品，读起来引人入胜，掩卷之后，经得起咀嚼。

写“本质伟大貌似平凡的生活现象”，是王汶石在选材上的特点。他几乎没写什么惊人事件，即使象《严重的时刻》那样严重的天灾也是个别的。极大部分都是农村中的“普通人平常事”，象区委书记检查工作，两个集体之间开展竞赛，由于热心集体养牛引起的家庭纠纷，卖菜过程中的风波，整风整社中干部、群众在田边的思想交锋，乃至打井，相亲等等，但是王汶石却从写平平常常的事件，普普通通的人物，揭示了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重大主题，写出了时代的风貌。从一本廿五万字的《风之雪夜》，我们看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奔腾着、呼啸着席卷中国大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个运动在农民思想上激起的强烈的震荡；看到了龙腾虎跃的大跃进年代里人们的精神面貌；看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们怎样艰苦奋斗，迎战困难；看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整风整社中人们思想上的波澜。由小见大，从平凡中看到不平凡，这是王汶石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

王汶石写“普通人平常事”不是见到什么

写什么，他有较强的政治敏感和较高的对生活的艺术感受能力，选材是严格的，假如说他采取的事件是生活海洋中的一滴，那么这一滴就是能够从不同角度反映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的一滴，是能见到大千世界的一滴。

当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潮头还只是隐约可见的时候，王汶石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他通过《风雪之夜》这个短篇及时反映了高潮的到来。《风雪之夜》写的是区委书记严克勤在狂风暴雪的除夕之夜，赶赴新建社进行验收工作的前前后后。但他并没有正面表现验收活动，却花了主要笔墨去从各方面描绘群众办社的热情。除夕这天，风大天寒，人们为夺取来年更大的丰收正忙着装配高温沤肥坑，一个个忙的满头大汗。对坚定走合作化道路的人，社是否验收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到如何使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上。白天忙了一天，到晚上社干部紧张地进行验收活动，而不少群众却自动聚集在饲养室，热烈地议论已经开始的新的生活，直到鸡叫之后。未经验收的社里的群众，办社热情如此之高，至于那些已被验收的社更是可想而知了。

作者还从侧面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领导工作，县委把两天的会压缩在一天开。接着实写了严克勤为争取工作主动，在会完之后连夜赶回本区。虽然北风怒吼，雪浪滔滔，风雪打得人睁不开眼睛，严克勤为县委会精神所鼓舞，他搏风斗雪到一个老社作了调查，又赶到那个新社去进行验收，并帮他们制订了来年的生产计划，为明天开始的新的一年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全篇充满着农村上上下下的人们“追赶时间”的气氛。

作者就是这样通过写新的一年开始的前夕，区委书记搏风斗雪进行工作，写渭河平原上一个新建社热火朝天的生活，表现了人们坚定而急切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心情和行动，帮助我们看到了滚滚而来的无可阻挡的合作化的潮流及其磅礴的气势和无比的力

量。

选材是不是精当，关键在于观察生活是否深透。解放前流落在外的王北顺奶奶，回王庄投奔农业社来了。这在五十年代该是多少平常的事，但是王汶石却从中看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的因素和它蓬勃发展的必然趋势。《老人》就是写的这个故事，北顺奶奶二十几岁死了丈夫，四十几岁又死了儿子和儿媳，她为辅养唯一的孙子，改嫁给邻村的一个瘫老汉，不久，瘫老汉也死了。在旧社会她真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成立了农业社使她找到了可靠的靠山，于是她带着北顺回王庄投奔农业社。由于对社的信赖与热爱，祖孙两人不仅产生了很高的劳动热情，而且迸发出为维护集体利益进行斗争的原则精神，老人并且由对共产党的崇敬与爱戴，产生了对入党的执着要求。当我们看到她站在凛冽的寒风中聚精会神听党课的时候，看到她坚持原则要外号“火蝎子”的雪儿妈拿回所选的棉籽重新返工的时候，看到她同青年妇女们一起步行卅里去学植棉先进经验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了在合作化的春风里，一株枯木又青枝绿叶充满生机吗！这是多么深刻而富有诗意的描写！类似的人物还有《套绳》里的撞槐，《春节前后》中的赵承绪，他们是那样与农业社血肉相联，农业合作化所以形成无可阻挡的潮流，不正是由于有了无数的这样的一滴又一滴吗！

王汶石写平凡的事件决不孤立地写，总是从纵的发展中，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联系中去描写。他曾说：“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每人都有一个生活斗争史，每一个平凡的生活现象都和另外许多事实和现象联系着，因而可能包含着重大的社会内容”。^③因此，他总是努力“找出这一切看来‘平淡’的生活现象的时代根源、社会根源、阶级根源，提炼出它的社会思想意义。”^④他认为“只要掌握了生活现象的社会思想意义，貌似平淡的生活现象，在我们的头脑里立刻就会显

得不平淡，显得深刻而惊心动魄了。”^⑤

《春节前后》可以说是写的家务事，儿女情。正月初一，由大姐娃发难与她的丈夫赵承绪闹翻了，承绪一气之下回到饲养室，三天未回家。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因而很不美满了。如今，家里只剩下大姐娃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何等冷清寂寞！三天年假之后，大伙都忙着出工，而大姐娃却在家里嚷鸡骂狗闹情绪。

真是两口子闹无原则纠纷吗？不是。作者经过深入了解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判断：是合作化运动在家庭生活中激起的波澜。本来对大姐娃百依百顺的赵承绪，在参加农业社后变了。对待入社，这一对从旧社会苦海里挣扎过来的人是没有分歧的。但是，却各有各的打算。作者追溯了形成分歧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大姐娃十九岁死了丈夫和孩子，独自养着婆婆，历尽艰辛。在一段时间里，她完全失去了一个青年妇女应有的那种家庭温暖。后来，赵承绪上门了，他们又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她认为：入了社，摆脱了小家小户做庄稼的狼狈局面，“该享享福了”。白天两口子出工，晚上，赵承绪守在她身边，“作针线也罢，认几个字也罢，守着孩子聊聊天也罢，或是抱着孩子进城看看戏也罢，”多么称心如意，多么悠闲自在。可是，赵承绪并没顺她的心，自建社以后，他忙得脚不点地，“多在门外少在家”。赵承绪想：在旧社会自己是个流浪孤儿，是南赵村的群众收留了他，培养教育了他，如今南赵村的群众办起了农业社，信得过他，选他当了副主任兼饲养股长，他怎能不“为南赵村的社会主义出死力”哩！这就是他们夫妻之间产生矛盾冲突的根由。多一点集体主义思想与多一点个人主义的小打算，竟是如此不能协调统一。这场运动反映在富裕中农的思想上，如《卖菜者》、《井下》所反映的那样，则是更为激烈的震荡。正是由于作者对这样平凡的题材，作了如此深入的开掘，所以

他有力的揭示了农业合作化这场革命的深刻性。

在谈到《新结识的伙伴》的创作时，王汶石说他曾经只是想通过写劳动竞赛来写人们的干劲，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他发觉这样写太肤浅、太一般化了。于是他根据题材提供的东西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妇女为什么干劲这么大？她们当前的全部生活包含着什么样的生活真理？”从而展开了对这一现象的时代根源、社会根源、阶级根源的考察，从考察中他明白了一个基本点：“她们之所以如此勇敢豪迈，是由于她们的社会地位跟往昔根本不同了，”^⑥正象恩格斯说过的她们从前过的是非人的生活，今天则过的是真正的人的生活。成为自觉的阶级战士之后，她们的才能和力量便象山洪爆发一泻千里、不可阻挡了。正是由于他经过考察，透过表象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因此，他就完全避开了当时流行的那种高指标竞赛的假大空的描写，完全避开了风行一时的通过写不吃、不睡觉、不结婚来表现人们干劲的描写，避开了那种对大跃进的廉价的歌颂，他在深入探索中得到了蕴藏在生活中的哲理和诗，原来构思的写劳动竞赛表现人们的干劲就成了小说的一个表面事件。作者通过写张腊月与吴淑兰的交谊，写她们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敢作敢为，力争上游的英雄气概，深刻地反映了新中国妇女的新的社会地位，新的命运，新的生活；他用饱含政治激情的笔，歌颂了由于这种真正的人的生活所引起的真正的人的感情的大爆发，从而形象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那个龙腾虎跃的大跃进年代。以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为具体表现的极“左”思潮是应该批判的，但是从劳动人民心底喷发出来的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却无比宝贵，永远值得艺术家们歌颂。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不是更特别需要发扬这种精神吗！

王汶石也写我们前进中的严重困难和严肃的斗争，但是，他从来不写困难压得人抬

不起头，不写在斗争面前人们看不到前景和希望，他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善于发现我们生活中那种积极向上的东西，捕捉到在斗争中富有生活情趣的细节，既把斗争的严重性写充分，又使读者具体感受到人们在为正义事业斗争中所具有的无比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严重的时刻》即是一例。渭河平原上秦渭公社的罗村管理区的人们，好不容易战胜了入夏以来五十多天的大旱，从燎原的天火里，救出了全部秋庄稼，可是不久又来了一场强大的冰雹，“密密的玉蜀黍林消失了，墨绿的棉田消失了”，田野呈现一片荒凉，人民群众的坚韧的斗争精神受到了严重挫折。但是，王汶石了解，人民群众受到挫折的坚韧的斗争精神，象是刚没有了火苗但还在冒着烟的干柴，只要用火一引，又会熊熊燃烧起来。

他塑造的公社党委书记陆蛟就是一团火，陆蛟及时带着救灾队伍搏风击浪来到了这个管理区，这团火一下子就引燃了那还冒着烟的干柴，严重的时刻成了人们振奋革命精神，迎战困难的关键时刻，“在田边安营扎寨，同老天争个输赢，”这就是关键时刻人们的誓言。在陆蛟安排下，“八路人马会罗村”，很快就把这里低沉的气氛改变了，人们心头上的晦气冲掉了，坚韧顽强，迎战困难的烈火烧得更旺。这不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迎战困难的一个缩影吗！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王汶石写的虽然是平凡的生活，但是，由于他选材精当，挖掘深细，剪裁得体，构思巧妙，角度新颖，因此，他的作品就能小中见大，总是使人感到有新意，有深度。

在当代短篇小说家中，王汶石是塑造人物的能手之一。他常常通过一个具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的描写，甚至是几个精采的细节，就能把人物写的活灵活现。他着意塑造的是

农村中普普通通的新人，象妇女队长张腊月 and 吴淑兰，老积极分子北顺奶奶，醉心于技术改革的大木匠，在农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公社党委书记陆蛟，大队长陈大年等。他是农民新的生活和新的精神世界的探索者，同着眼于写我们生活欣欣向荣的一面一样，他着眼于写人们的阶级觉悟，人们新的精神生活和他们的发展趋向，歌颂那种积极向上的东西；他也写有着沉重的因袭负担的人，象从旧社会苦过来的大姐娃、富裕中农王云河、铁旦老八等，他把他们身上的那些旧思想、旧意识作了入木三分的揭示，但不是为了展览这些东西，而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他们怎样向自己的过去告别。

王汶石是通过塑造农村新人来反映我们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他特别注意把人物的生活动向与具有时代意义的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在具有时代意义的矛盾冲突之中，塑造人物，写人物的发展变化。这是王汶石的思想高度和他艺术表现能力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体现。思想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不可能对生活观察得那样深透，并对题材作出恰当的选择；不具有相当的艺术表现能力，不可能把交织在一起的东西写得天衣无缝，真实生动，深刻感人。

王汶石善于把在生活中捕捉到的具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艺术地再现在作品之中，让人物在他结构的矛盾冲突中作自我表现，从而使人物活起来，这是王汶石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在他的作品中这种例子很多，《大木匠》就不用说了，它从头到尾被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贯串着，曾被改成戏剧上演，得到广泛的好评。《春节前后》的戏剧性的结构与《大木匠》差不多，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贯串始终，心灵手巧，泼辣、干练、勇于同旧思想、旧意识决裂的大姐娃，就是在矛盾冲突中作了充分表现，让我们认识的。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在情节进展恰当的地方，结构出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作者在

这里挥洒自如，集中塑造人物，如《卖菜者》中对王云河的塑造，就是通过写王云河对卖菜地点的选择、察行情、等高价、往菜里湿水……与同伴和顾客发生的矛盾，多方揭示王云河的内心世界，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与旧思想、旧意识决裂过程中的，混名叫“积极叔”的富裕中农的形象。

《沙滩上》林檎树下吃西瓜一场，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篇小说写的是六十年代初期，在整风整社中所出现的种种人民内部矛盾，如同级干部之间的矛盾、上下级之间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等等，如何正确解决这些矛盾，是能否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的关键。作者通过写《沙滩上》，成功地塑造了大队长陈大年的形象，及时回答了生活中提出的问题。

林檎树下吃西瓜一场，是矛盾的集中暴露和集中解决。看这场“戏”，我们不能不赞叹作者组织矛盾塑造人物的高超技巧。这里写了四个人物，四个人物构成了六对矛盾：大队长大年与副大队长囤儿的矛盾，与七队队长陈天保的矛盾，与“逛鬼”运来的矛盾；囤儿与天保、与运来的矛盾；还有天保与运来的矛盾；矛盾尖锐而又错综复杂。作者在矛盾冲突的开展中重点塑造陈大年，写这个有党性而又有才能的大队长怎样正确对待整风整社中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并且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新的基础上团结干部和群众继续前进。这一切描写绝无平板、冗长、概念化的毛病，矛盾冲突的开展非常自然而又充满生活情趣。

这场“戏”在撂了挑子的副大队长囤儿光膀子埋头干活的田边展开，原来见了囤儿躲就躲不及的“逛鬼”运来，正大模大样地坐在林檎树下大胆地对囤儿进行调笑。见大年来了，运来就想溜走。其实，大年不象囤儿那样，对运来板起面孔训斥，他决心帮运来进步，并且还要帮他找爱人成家。可是运来却

不怕囤儿，怕大年。大年见运来想走，笑着说：“不要红，运来哥，你可千万不能脸红，一红啊，你就把气冒了。”“来，吃了瓜再走。”一个要走，一个要留，一个要帮，一个怕帮，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于是通过外在的形式展开。话从运来拿西瓜时撕破了裤子谈起，谈到卅三岁的运来该找个姑娘成个家了。运来却自暴自弃：“我的名声扫了地擦了桌子了”，“结婚，找谁结婚？”可是大年很了解他，深知他有积极的一面，大年借拖拉机手之口，讲了不少运来在外村干的好事，把他帮三个老汉装四部水车和下井捞水管的事讲的具体而动人，从而启迪了运来的自尊心，使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还是一块正经材料。”大年抓住时机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不管干啥要有心劲，不论遭到啥事，顶顶要紧的是不能心松，心劲一松一个人就垮了”。这话引起了运来的共鸣，于是他敞开胸怀说出了心里话：“有时，我想到自己是个人民公社社员，我比谁也不差啥，我的干劲就来了。有时，看自己不值一个鱼眼麻钱，我就把镰把一丢，心里想道：‘去你的吧！你们愿意咋就咋，我逛去呀！’”找对了钥匙，打开了锁。大年又接着说了一段既是对运来交心，又是作囤儿的工作的话：“其实，不唯你，就连我们当干部的也这样。”“遇到挨批评，受闲气，工作棘手的当儿，就想：‘去你妈的吧！老子当个社员才清闲！……’”这话说得多么平易，多么贴心，不是简单的说教，没有象囤儿那样板起面孔训人，但是思想工作却作到了人的心坎上，使运来打消了疑虑，活跃起来，紧接着在大年解决与天保的矛盾时，他就起积极作用了。矛盾冲突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展开着，问题就这么入情入理地解决着。作者没有多少另外的说明或描写，人物的神态由于自我表现而愈来愈清晰，使我们不仅看清了他们的面貌，甚至看到了他们的心灵。

机灵的运来听出了大年的话的弦外音，他瞥了囤儿一眼咋乎道：“是有这号情形，有，

有！”经他一咋乎，囤儿绷着脸，不说也不笑了。大年见话题太严肃，马上笑着要大家吃西瓜。这是第二次运用西瓜这个道具，头一次从西瓜引出“戏”，这里是用西瓜缓和气氛，表现了大年在作人的工作时善于从实际出发，机智灵活，因势利导的才能。

七队队长天保上场，作者第三次运用了西瓜这个道具，促进了矛盾冲突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大年与天保在原则问题上的短兵相接，大年的性格在这里闪现了耀眼的光彩。

陈天保既有点疲沓，又有点自以为是，公社确定权力下放，他认为就是大队干部对小队工作“闲事少管”，动不动就把大队干部的话顶回去。囤儿挨了顶，撒手不管了，大年也挨过顶，但是他“碰回去，又来了。”在吃西瓜时，从天旱瓜甜，谈到七队有片玉米地没有浇水，大年单刀直入问天保：“大队布置了抗旱，你怎么不执行？”天保强调劳力调配不开，遭到了运来有理有据的反驳。大年进一步提出：“咱们先琢磨这片玉米浇不浇？”天保却固执地说：“我自有计划，你不用给七队操心。”在原则问题上大年寸步不让，他平和的但是坚定地说：“我干的就是操心事儿，怎能不操心？”“把你的计划摆出来。囤儿也在这儿，咱们合计一下——现在你来报告！”天保见大年执意要管，只好粗略地把活路安排说了一遍。听完，大年要运来先提意见，运来受宠若惊，他激动地提出队里有一台有毛病的柴油机，毛病不大，好拾掇，可以修起来抗旱。天保根本没把运来放在眼里：“你知道什么！好拾掇，可就是找不到人。”拖拉机手知道运来在拖拉机站是学了些技术的，指着运来告诉天保：“这不是现成的把式！”天保不信，拖拉机手进一步说明了情况，天保愣了半天才笑道：“我一向把这神当成半截钉子，往哪块木头上钉也钉不进去，没想到这神还是个洋螺丝！”大年见水到渠成，对天保说：“天保叔，怎么样了，灌或不灌，主意要你拿哩！”天保说：“你拿一拿怕什么？”大年说：“可

是你对囤儿和我都说过，权力下放啦！”天保尴尬地笑道：“大年，看你这娃么，唉，这娃咋是个这！”他用深深赞叹的目光，盯着大年。

王汶石就是这样在所结构的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中去深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赋予人物以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让人物在自我表现中显示各自的个性特征，完成人物塑造。看完这场“戏”，一个政治上成熟，思想境界很高，善于联系群众、善于做思想工作、很有领导才能的大队长陈大年就栩栩如生地站到了我们面前，运来和天保也都各具神采。若不采用结构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让人物作自我表现的手法，要在如此短的篇幅里，通过写那样错综复杂的矛盾，写出几个各具个性的人物，恐怕是很难办到的。

王汶石笔下的人物色彩鲜明，性格各异，这与他善于采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人物是分不开的。

恩格斯曾经提出要“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⑦王汶石在这方面作了成功的探索。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中，这种例子也是很多的。比如《沙滩上》陈大年与囤儿的对比，《大木匠》中爱唠叨的桃叶妈与沉默寡言的大木匠的对比，《夏夜》中在对待树红学开拖拉机的问题上女拖拉机手玉琴和芸芸的对比，在《新结识的伙伴》中张腊月与吴淑兰的对比等等，这些对比有的起相互烘托、陪衬的作用，有的有利于展开性格间的冲突，从而使形象更加鲜明。

《新结识的伙伴》中运用的对比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作品开始，张腊月与吴淑兰见面，就使用了对比手法，“你是吴淑兰吧？……昨天，你一开口发言，我就想：这一定是那个有名的吴淑兰……总说去看你，一直没腾出工夫。……啊呀，天，你长得多秀气啊！……”第一次见面张腊月就噤里啪啦说了这么多，不是泼辣赤诚的人，谁还能在

没有明确对方是谁的情况下，就把自己对对方的估计，过去想去看她的打算，都一古脑儿的往外倒哩！谁能第一次见面就去议论对方比自己长得秀气呢！她说了那么多，吴淑兰却一言未发，只是眼睛在问：“这是谁呀？”张腊月察觉到对方在问，又自我介绍：“我是张腊月。……”“闯将张腊月。听说过吧？”直到这时候吴淑兰为张腊月的赤诚、大方所感染，才活泼起来，说道：“知道，知道！”“听乡长说，你也来开会，……前天，投我到乡里，乡里人说，你已经起身了。……”未等吴淑兰说完，张腊月又插话，进一步自我介绍：“我是个火炮性子，一点就响，不爱磨蹭”。至此，一个泼辣、大方、赤诚、利落的闯将的轮廓就画出来了，在她的对比下，吴淑兰显得多么文静稳重。

接着作者运用了一系列的对比表现他们性格的差异，比如对待争夺红旗，张腊月和她的战友们是凭借她们的闯劲，她们蛮勇无比，敢作敢为的精神；而吴淑兰和她的战友们则是不声不吭与张腊月暗赛，把“赛倒张腊月”的小纸条贴在每个人的工具上，暗中使劲。在家庭里，张腊月对婆婆和丈夫可以招来使去，而吴淑兰则是丈夫的“贤妻”婆婆的“好媳妇”等。

用对比的描写来表现性格的差异是重要的，但是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还必须写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在她们正面交锋中去进行对比刻划。《土屋里的生活》中的江波与罗品超（特别是江波）所以写得比较单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作者没有从他们之间应该产生的正面冲突中去表现，因此江波显得特别苍白，没有光彩。

《新结识的伙伴》中，作者非常注意表现性格冲突，在张腊月与吴淑兰的正面交锋中去进行对比刻划。对吴淑兰夺走了红旗，张腊月是公开宣战：“不要太高兴得早了！你这个好女人哟！……有张腊月标着你干，你想喘口气也办不到！”可是吴淑兰只是笑笑，

默不作声，但是潜台词是明确的，你想再夺走红旗吗？“这个张姐呀！想了个美！”吴淑兰的坚定与刚毅在这里显示了出来。而在与张腊月及其队员的唇枪舌剑的正面交锋中，这两个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更突出。张腊月说的话带有浓厚的火药味，“马踏南二社，捎带刘杨村，收回大红旗，永远扎住根”的口号，具有很强的张腊月的个性色彩，“好，欢迎你来踏一踏试试！非叫你连人带马投降不可！”这话柔中有刚，出自吴淑兰之口。通过那场短兵相接的正面交锋，作者最后完成了对泼辣、大胆、热情、豪爽的“闯将”张腊月 and 文静、善良、坚定、刚毅的吴淑兰的塑造。

王汶石笔下的人物所以那样血肉丰满，活灵活现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运用了真实、生动、极具表现力的细节描写。而且他总是把自己热烈而饱满的政治激情，渗透在冷静而细致的描写之中。

王汶石的细节描写多种多样，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通过写人物的动作，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的心声变成具体可感的东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在我们来看大姐娃扔搅料棍的细节描写。

大姐娃本意是想把一心扑在农业社饲养事业上的爱人赵承绪从饲养室拉回家里来，可是，由于她一时任性说了许多刺痛了赵承绪的话，把赵承绪气走了，而且已经三天没有回家，因此，大姐娃闹起情绪来了。

日头已下窗台，她还没有做早饭。炕不叠，地不扫，恶声恶气地站在院中，嚷鸡骂狗，忽又捞起根棍子，赶得脱圈的猪娃满院跑，直到鸡狗猪们被她制服她才闲站下来，却又觉得闲着不做事，反而格外空虚寂寞。

这段描写，简直把大姐娃那种百无聊

赖，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绪活画出来了。接着是扔搅料棍的细节描写：

大姐娃低着头，偶然发现手中正拿的是那根给牛拌草的搅料棍。那仿佛是什么不祥之物，又仿佛烫着了她的手，使她立刻眉头紧皱，望着北边的院墙（那里是饲养室，赵承绪就住在那里）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个“贼”字。同时，使出全力，扬起胳膊，那根棍子便在空中旋转着，越过墙头，落在墙外。

这个动作的潜台词丰富极了：对鸡狗猪们发脾气有什么用呢？可恨的对象在北边的院墙外。她低头发现自己手里拿的正是赵承绪用过的给牛拌草的搅料棍，这是多么撩人，多么惹人心烦的东西，如今牛已经归集体饲养了，人已经不回来了，“人家爱上了那些四条腿，爱脚蹬母牛，怀抱牛娃睡觉，”家里留下这东西有什么用，于是，使劲把搅料棍扔了。这个细节描写把大姐娃的空虚寂寞，把她的悔和恨都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王汶石的细节描写不仅多种多样，运用也极其灵活，它有时被用来生动、形象地介绍人物，有时又象一扇被打开的心灵之窗，有时用以作辛辣的讽刺，有时又用以作热烈的褒奖。他常常经过细节的点化，就可使人物活了起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汶石是勤于艺术追求的作家，但是“艺无止境”，我们深信在新的长征中，王汶石会在写农村题材方面作出更多的、更好的、无愧于我们时代的贡献。

① 王汶石：《〈风雪之夜〉后记》

②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③⑥王汶石：《答〈文学知识〉编辑部问》

④⑤⑧ 王汶石：《漫谈构思》

⑦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